

依 藤散文選 (1954/57)

【導 讀】

依藤，本名汪開競（1912-1976），祖籍江蘇昌泰，南來後定居檳城，一生致力於文學與教育活動；另有南島居士、陶然、金惠吾、慎良、落人等筆名。尚讀中學的汪開競先生便與友人主編《南洋時報·玫瑰副刊》，於一九二七～二九年間，一共出刊五十二期。一九三三年，汪先生出任鍾靈中學史地科主任，於一九七二年退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佔領馬來半島之後，開始對中日抗戰期間大力支持反日活動的華人社會施行「大檢證」，逐一清算舊賬，大規模逮捕與屠殺涉嫌抗日的華人。尤其那些有名的籌賑抗日份子及其家屬，更是抄家滅族，連那些跟他們打過交道的友人也是一併遭殃，此等惡行當時稱作「瓜蔓抄」。僅僅檳城一地，被屠殺的百姓就多達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不幸殉難、下獄或逃亡的知識份子不計其數。「逃亡」和「悼亡」遂成為戰後初期馬華文學非常重要的主題。

當時的悼亡文章分兩大類別，一是悼念殉難的文友，一是悼念遍及馬來亞各地的大屠殺。這些文章見證了日據時代殘暴的軍國主義政權，以及截然不同於英殖民的苦難經驗。

汪開競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寫下〈鍾靈中學員生殉難記〉，記述了那場親身經歷的牢獄之災，並哀悼因此殉難的數十位鍾靈師生。後來，他正式用「依藤」為筆名，以《光明圈外》為題，在一九五四年的《南洋商報·商餘副刊》發表一系列以日據時期的檳城為主的歷史散文。這系列散文，於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式結集成《彼南劫灰錄》（列為趙爾謙博士主編的「鍾靈叢書」第二種），是馬來亞獨立

後出版的第一部馬華散文集，也是依藤的第二部個人著作。專精於中國古典小說的依藤，曾以史家的眼光評述《水滸傳》，結集成《舊小說新談》(南洋報社，1954)一書。從水滸傳奇的評述，到彼南劫灰的紀錄，依藤試圖以史家之筆，融入散文的意境。

《彼南劫灰錄》是一部反殖民的歷史散文。

依藤在〈後記〉裡表示，如果此書能夠在日本投降之際立即出版，在飽經戰火憂患的星馬人民心中，會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事隔十年，世局已變，在檳城各大商行裡充斥著東洋貨，人們似乎早已忘掉「彼南時代」的一切慘痛經驗。他始終認為歷史是最可貴、最無私的紀錄，他並不仇恨日本人，他痛恨的是日本軍國政府的法西斯和武士道精神。他最憂心的是日本降軍自昭南島(新加坡)撤退時，居然公然聲稱：「日本將在三十年後重回馬來」，一向缺乏憂患意識的馬華社會，恐怕不會牢記歷史的教訓。他於是決定寫下彼南的劫灰錄，作為警世之言。

依藤的遺憾和憂患，造就了一部出色的歷史散文。

歷史散文有別於一般史料或純散文，它必須在記述客觀史實的同時，維持一種敘事語言和手法相對柔軟的散文筆調，萬萬不能僵化成冷硬的史料，畢竟它是散文。歷史散文可以自由呈現主觀情感的收放起伏、個人的生活見聞和文化視野，並關注大敘述夾縫裡的小事件(這些小事件正是大歷史的局部見證)。

正因為經過近十年的沉澱，此書的敘述文字並沒有像李冰人等戰後作家懷抱著巨大的仇恨，在雜文、散文和小說裡肆意重現刀光和傷痛。依藤在悲慟的敘述中，保持理性的距離，同時兼顧到修辭與書寫策略、情緒鋪陳、史料轉化等重要創作要素，沿著歷史的時間軸線，透過親身經歷的見聞，逐步重現那個無法遺忘的時代——從百姓對英軍的高度信賴和失望、被日軍佔領的苦難日子，到二戰結束後的社會光景。

依藤散文的語言乾淨俐落，且能因應事件情節來調整柔軟度，無論針砭或譏諷，都有不同的神采。也許正是長年研讀章回小說，依藤一方面能夠很細膩、逼真的勾勒出彼南人民的心理，同時又能夠宏觀地架構出彼南的社會脈動(並記錄了當時的一些慣用方言和中文語彙)，讓這本隨時被誤認為雜文或史料的書，得以跨入歷史散文的藝術境地。

曾在六〇年代受教於汪開競先生的李有成認為，這是「一部淪陷時期檳城的社會史」，「全書對日本統治者的蠻橫暴虐固然語多撻伐，對日據期間形形色色的眾生相也頗多描繪，其中包括了趁火打劫的所謂『亂世英雄』、神通廣大的『文化人』、在《彼南新聞》中大發偉論的『彼南紅人』、各民族協會的領袖新貴、檢舉無辜同胞的冒牌『地下工作者』、在大肅清中出賣親友的所謂『新女性』等等，群丑亂舞，不一而足。」（《彼南劫灰錄》五十年後）2007）

本卷選取了依藤的十七篇散文，全部來自《彼南劫灰錄》（檳城：鍾靈中學，1957）。此書共收錄四十四篇長短不一的系列散文，跟當時一般散文集將零散篇章結集方式不同。這些散文雖然發表在獨立之前，但《彼南劫灰錄》作為一個整體，卻出版於獨立之初，正好跨入「獨立後五十年」的選文界線，取得合法的時間座標。

五〇年代末期出版的散文集本來就不多，此書在敘述手法、語言風格、題材視野等方面的整體表現，都十分突出，絕對足以位列馬華散文名家之林，故以此書作為這套選集的開章之作。

十二月八日這一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檳城歷史上是一個最不平凡的日子。

這一天，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強大」的日本海空軍偷襲美國的太平洋根據地，在幾小時內把美國的太平洋海軍精銳消滅了。同一天清晨，日本空軍，利用印度支那的根據地，向星洲軍港擲下大量炸彈。太平洋的全面戰事，就這樣爆發起來了。

檳城在這一天早上，當無線電還未宣布事實真相之前，一切都顯得平靜和安定。人們的生活和以前一樣，街道上雖也擁滿了人，他們似乎並未為著世界動盪不安的局面而焦慮。從印度洋那邊吹來炎熱的季候風，在所謂「東方花園」的上空掠過，分外加深了人們懶散的心情。

那時太平洋風雲雖然緊急，檳城市民對於治安當局，確實抱有一百巴仙的信心。至於歐洲戰局，自從六月間希特勒的「笨煞」師團衝進了俄國境土，不僅英國人鬆了一口氣，就是馬來亞的居民也以為從此可以「高枕而臥」矣。到了十二月初，德軍已衝到了莫斯科附近，情勢是相當嚴重的，但紅軍仍在拚命惡戰，毫無衰竭之象。非洲的戰場，英軍情形比較好，仍在利比亞一帶和墨索利尼的部隊作拉鋸戰。在遠東，報紙上天天登著日本即將南進的新聞，同時英美等國軍事會議的消息也頻頻傳至。當時的局勢是：日本軍隊已在越南獲得了立足點，海軍強大艦隊，正「虎視眈眈」對著馬來亞。不過，大概由於居民一百年來傳統心理的作祟吧，他們對於大英帝國的力量估計得很高。各重要都市每月都舉行著防空演習，當局還甚至強迫居民挖掘防空壕，說這是「未雨綢繆」。街道上最出風頭的人物是頭戴鋼盔的 ARP（防空隊員），他們雄赳赳地在馬路上馳騁，似乎東洋人的炸彈毫不在他們眼中。此外，當地的駐軍也增加了，頭上裹著巾的「印度阿三」，和滿身漆黑的「非洲勇士」，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不久，又來了一批白皮膚的澳洲軍，他們把一切看得輕描淡寫，每天吃飽了雞蛋牛油，誇說：「假使矮

子敢來，我們有湯美槍對付他！」

馬來亞的居民，大約是吃了這些「定心丸」，所以對於東洋佬南進的問題，也是看得十分冷淡的。不過市面上，「戰爭」兩字也彷彿成為市民的口頭禪了。米糖已計口授糧，汽油也限制了，星加坡的總督湯姆斯爵士，親自以身作則，用腳車代步。當局鼓勵男人穿短衫短褲，說是既經濟，又便利。馬來亞的氣壓是低沈的，但在倫敦製造的坦克車和大炮展示下，人們至多只會這樣自慰一下：「讓他來好啦！」

另一方面，華人的抗日情緒卻高漲到了沸點，籌賑會、抗日會、公開活動，當局也不大干涉。幾乎上自富翁頭家，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地題特別捐、月捐、寒衣捐，每個月總有幾百萬匯回重慶去；各處報效之聲，前呼後應。歌唱團、活劇、連續演出。還有一種街頭劇，利用簡單的設備，動人的表情，在市民心中起了絕大作用。一些暗中販賣日本貨的，只要一被查出，立刻招牌上被塗上烏油：警察局一隻眼開，一隻眼閉，裝聾作痴，好像故意不管似的。其實要管也管不了。那支〈保家鄉〉歌曲，現在也被歌唱家改為〈保衛馬來亞〉了，「起來」之聲，更是響徹街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之前的「東方花園」，就是這樣一副輪廓。

然而祇在一夜之間，這情形就變得不可思議了。當無線電報告日本飛機轟炸星洲的時候，市面上頓時緊張起來。「開戰」兩字真正像有不可形容的魔力似地，緊扣著每一個人的心絃。手頭有點錢的紛紛搶購食糧，因此雜貨店老闆無不笑逐顏開；不管戰局怎樣，眼前且先賺了再說。布店生意也不錯。市民的一般心理，以為戰爭既然開始，自然有一個長時期的相持，那時衣料不繼，或者價錢高漲，不如乘現在有機會多囤積一點。至於其他日用品，以及零星食物，甚至幾兩香菇，也紛紛成為人們搶購的對象。

報紙上直到第二天才用特號大字標出：日本對英美宣戰！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日本猛炸星加坡！……這些都是足以引動讀者的頭號新聞；可是在檳城市民眼中，尚屬次要，使他們最觸目驚心的卻是這一條電訊：

日本軍隊在哥踏峇汝登陸！

哥踏峇汝是吉靈丹的首府，日軍既已登陸，那麼戰火已燒到馬來亞本土了。

——人們奇怪起來，英國的海軍哪裡去了？陸軍哪裡去了？預備以湯美槍對付東洋佬的澳洲軍又哪裡去了？報上轉載星洲發出的軍事公報宣布：「局勢已在控制中，」意義模糊不清；相信民主國家力量的人漸漸懷疑起來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當地駐軍那麼雄厚，竟讓東洋兵在東海岸搶得了橋頭堡壘？

八日下午檳城天空中有幾架飛機掠過，並沒有發出什麼空襲警報。但老於世故的同胞們已心頭不安著，在他們繃起的面孔上似乎意味著一種警告：

「糟啦！」

[*編者註]：菲洲，即「非洲」，在此保留原來的譯名。

共榮圈禮物來了！

我們居住的地方，風景優美，在山明水秀之中，充分含有東方人古色古香的風情。這地方，雖還不像巴里島的聳立海外，與世絕緣，但我們假如不吹毛求疵，一百年來和和平平安安的生活，倒也不啻是桃花源第二了。居民初出茅廬，就孜孜矻矻地為生活奔忙，略有資財的在郊外造一間玲瓏精緻的別墅，悠然渡過他們的一生。所以前些時，你要同他們談起戰爭兵禍之類的話，他們會嗤之以鼻，笑你狂妄，也許正為了這種漠然無動於衷的思想，他們對於政治，不管是外來或是當地的，都一律鼓不起興趣。

歷史上使當地居民嗅到一點子火藥氣味的，據說是在三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那時有一艘德國輕巡洋艦，曾偷駛進這個狹窄的海港，開礮打沉了一艘俄國軍艦；清晨隆隆的礮聲，確曾使居民驚訝不已；可是德國巡洋艦來得快，也去得快，大概只騷擾了短短一兩小時，又讓這美麗的小島披回了安靜的外衣。

而今卻不同了；隨你去問街上任何人，他們都一致承認日本人的南進，不僅

會把戰火帶到馬來亞來，也會使這百餘年一直保持著平靜生活的島嶼，一腳踏進火海中。——不過，什麼時候才開始踏進呢，這問題卻沒有人敢回答；尤其是當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他的軍隊已跨上吉蘭丹沿岸之後。

按照人類普通的習性來說，他們總希望即使不能避免戰爭，而讓戰場離開得遠一些，自然是更好的事。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接著七七蘆溝橋事變，八一三上海大戰，以至全面抗戰，這裡的人——除了華僑之外——都是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去迎接這些戰爭火花；到了歐戰開始，希特勒竟在幾個月時間內打垮了法、波、挪威、荷蘭等國，但我們老是因為戰地離得我們很遠，正照樣做著酣夢哩。這也難怪，這群忠厚質樸的居民，一向是絕對信賴治安當局的，他們卻不曾曉得在幾天之內，情形已經惡化到無以復加。

自十二月八日到十日，三天之間，在哥踏峇汝方面，日本軍隊已獲得了堅強橋頭堡，並沿鐵路線前進，星洲軍報對這一線的描述是「情形模糊不清」幾個簡單的字眼。同時，另一支日軍也在暹羅宋卡登陸，他們在一夜之間，壓服了暹羅的抵抗，——暹羅根本不曾抵抗，他們老早就準備靠攏了，這是他們傳統的外交政策——長驅向吉礁北部直下；照他們的軍略，大概想用鉗形攻勢，夾擊吉隆坡。那麼馬來亞當局如何對付呢？我們在當時的報紙中，間或讀到一則英國飛機去轟炸宋卡日軍登陸據點的新聞，然而並不很有勁。有一天報上說荷蘭——已向日本宣戰——潛水艇擊沉了五艘日本運輸艦，這些消息都是不著邊際的，市民們焦灼地期待當局有一個堅定，並且能夠使人興奮的聲明。

開戰兩天，日本飛機好幾次出現孤島上空，軍用機場早已領教過東洋炸彈的滋味了。（路透社記者拍到星洲的電報，說五架迎戰的英國飛機全被日機打下；但過了一天，星洲軍報卻公然宣布日機五架被擊落。）市面上繁盛的區域，居民們紛紛把家眷安頓到郊外去，「出有車」的人自然佔盡了不少便宜，在馬路上風馳電掣，橫衝直撞，三輪車成績也不壞。不過人們雖然忙著搬家，大都取得一種戒備態度；由於接連兩天日本飛機並不曾炸擊市區，市民覺得很安心，認為這僅是暫時現象而已。

十二月十日早晨，天氣陰沉，空中層雲如墨，冷風瑟瑟，配合著接連來到的凶訊，使人們意料到將有什麼不幸臨頭。市區搬家的人數更多了，大路上排滿著

車輛，或向西北到亞依淡村，或朝東北到浮羅地滑。這兩地，三天來已莫名其妙地增加了大批人口，但還未到飽和狀態；因為許多居民，仍舊依戀著他們已數代相傳的住宅，不肯輕易離開。

早晨的消息很壞，英國兩艘增援馬來亞的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及擊退號，在關丹海面被日本魚雷機炸沉了，報上大字標題登載著「日本強大艦隊進攻某地」，「強有力之日本海軍轟擊某地」，幾天的報紙電訊，沒有一條關於英美軍隊的動態。人們嚴肅地注視著這些新聞，同時全市區更散布著一種令人不安的謠言，說所有英國駐軍已開始秘密地撤出本地。

十一點鐘光景，天空出現了二十六架日本飛機，分成九隊，自東北飛來，向西南飛去。當它們環繞全島一匝後，又從西北方面再度出現，並朝市中心，包括海港一帶緩緩前進。住在海濱的居民，仰起頭來，眺望著這群不速之客，有時還指指點點，爭論著幾架幾架。幾分鐘後，空襲警報發出了，再過一會兒，又發出緊急訊號，住在離市區稍遠的人，很清晰地聽到一陣激烈的機關槍聲，接著隆隆炸彈聲好像遠處傳來的雷響一般——不久，祇見馬路上幾個 ABP 氣急敗壞地踏著腳車飛奔，嘴裡嚷著：「炸彈！炸彈！快逃！快逃！」

這是本市百年來第一次接受血的洗禮的一剎那。現在要詳細記述那一次轟炸，似乎因為印象比較淡了，不會生動。我們祇記得，日機大炸後不到十分鐘，那條寂寞的亞依淡大道，突然出現了大大小小，各色各型的汽車、腳車、三輪車，甚至還有步行的，凡可以攜帶的東西，無不裝在車裡，或背在肩上；也有赤手空拳，滿身血跡，嚇破了膽的女人，瘋狂地奮力向前跑。你問他們跑到那裡去，目的地何處？他們一句話也說不出。總之，他們都是從被炸區域裡逃出來的九死一生者；他們要躲避日本飛機的炸彈，又要躲避日本飛機的機關槍，在他們看來，逃得性命已夠了，還管什麼前途不前途呢？

以後的情形，大可以預料得到。日機的轟炸雖僅短短三十分鐘，但造成本市空前的混亂局面那是任何人所不敢想像的。不客氣的說：一百年來，我們在本地造成了秩序，造成了治安，然而在這次考驗中，顯然大有漏洞。因為這些禁不起一炸的居民，如今正像一群被追蹤的瘋獸，他們已不知所謂秩序和治安，他們老實不客氣撕破了平時的岸然道貌，至少在這幾天裡，法律已不能再束縛他們了。

——然而驚弓之鳥的餘生者喲，他們的想頭⁸又是多麼糊塗喲！

手執籐棍，頭戴銅盔的警察，以前素來是神氣十足的，兩天後，都逃得精光了。

[*編者註]：「想頭」，乃廣東話常用的語彙，即「想法」。但此詞經常帶有貶損之意。

天堂地獄

這話怎麼講呢？原來我們這個美麗的城市，自經過日本飛機接連數天的濫炸後，全市已空無一人，到處只見斷垣殘壁，白天固然荒涼得怕人，一到晚上，那一種陰森森的景象，就不啻是鬼世界一樣。日本飛機，的確不分皂白的濫炸。因為市區根本不是軍事險要，又無防空設備。當第一個炸彈擲下後，市民們瘋狂地沿馬路奔逃，頭上的日本機師就對準了他們以機關槍掃射；日本飛機飛得很低，所以被機關槍掃射致死的人比直接被炸彈炸死的人要多好幾倍。一炸之後，居民嚇破了膽，都逃到郊外去了，沒有人再敢回來住。那些被炸死及被機槍擊死的屍體，東一個，西一個歪倒在路上；有的人身體還好端端，頭卻不知去向；有的人臂膀和腿飛散開來，血肉模糊，幾隻野狗在扯著咀嚼。一個汽車夫前身伏在車上，一片炸彈碎片把他半個天靈蓋削掉了。至於房子倒下，連人帶屋一起埋葬在內的更不知有多少。據非正式的估計，第一天出其不意的轟炸結果，約有一二千人死於非命，這數目並不算是誇大。

市區變成墳場，鄉村卻反而熱鬧起來了。一個小小的亞依淡村，平時不過住上一兩萬人，如今竟容納了超過十五萬人以上的戶口。平均計算，差不多每一戶都要住上三四十人，每一間小房間至少擠了十幾個房客。這種現象，一百年來還是第一次。不過人們驚魂初定，逃得了性命，雖財物損失不貲，有此立錫之地，

也略堪告慰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不敢令人置信的謠言到底逐漸證明為事實：駐軍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撤走了。接著是行政人員捲起舖蓋，都在晚上偷偷溜走了；兩天以後，島上已難得見一個「白皮」，雖說仍有幾個不願馬上離開。負責當局事前並沒有堂皇的布告聲明他們為何要撤走，這意味著前線消息很不好；不幸的「棄兒」既因逃避空襲而日夜提心吊膽，又要顧慮未來的安危。他們想：萬一日本人打進來，那怎麼辦呢？

整整一星期，我們是處在一種無政府的狀態。現在我們才真正嘗到了無政府的滋味。人們久受法律的桎梏，一旦解脫開來，精神上雖是爽快，但也感到痛苦。第一法律自然暫時取消了，一般城狐社鼠卻因此大肆活動；他們最先還止於偷偷摸摸，「趁些兒孽障」，後來，明知沒有人去打理，便大膽起來，糾集黨羽，晚上大夥兒明火執仗，到村裡來搶劫。聽說警察逃走時遺留的槍枝，有一半到了他們手中，所以武器齊全，要對付手無寸鐵的居民，誠然是易如反掌。

面對當前的危機，居民且把日本人來不來的問題束之高閣。有思想的人便提議所有村民大家來開一次大會，討論如何對付這些「暴徒」。在此，我們的確很欽佩炎黃子孫的組織力，他們能夠臨危不亂，從容布置。雖知凶多吉少，但大家還是緊緊地團結起來，準備應變。

這一天是十二月十一日，離開「大東亞聖戰」才祇三天。晚上九點鐘敲過不久，一隊「好漢」全副戎裝，浩浩蕩蕩從大路長驅而來，他們先攻擊住在村口的幾家。因為事前已準備好，所以攻擊一開始，每一家就立刻拚命敲打「火油箱」。敲打火油箱是一種警報，好讓其他人家有所準備。村裡前前後後——山區的不算——也有好幾百戶，假使每一家敲起火油箱，這「鏗鏘鏘鏘」之聲雖然不會震天動地，也可以說是響徹雲霄了。繼敲油箱之後，每一家凡是有些腕力的男子漢，儘他們可以利用的現成利器，譬如有許多人把削尖的樹幹權充苦竹槍，也有人則爽性拿起菜刀來，這樣集攏起的烏合之眾，想不到竟然能夠打退那些挾有來福槍和巴冷刀的好漢們。第一次攻擊不逞，好漢們轉變目標，抄近路去搶掠一家餐館。（大概是醉林居吧？）這家餐館依山而築，小巧玲瓏，是外來客人必到之地，也許因此而使「好漢」認為大有油水，集中全力攻擊；這一來血戰就開始了。好漢

們開槍（？），飛石頭，餐館也不示弱，上自老板，下至夥計，約莫有三四十人，利用汽水瓶、菜盆、碗、玻璃杯還擊，加上雙方喧殺之聲，附近震耳欲聾的敲洋油箱聲，格外覺得壯觀。我們不知這場鬥爭的激烈情形和正在前線相持的英日軍隊有什麼分別。——可是這一群可憐的老百姓，剛剛嚐過東洋飛機的滋味，又要來經歷一場可怕的災禍，總算是不幸之極了。

戰事延長至深晚一時以後始停。「好漢」終於不得手，從小路退去。翌日早晨，人們鬆了一口氣，睜著惺忪的睡眼，到餐館附近去看看，只見滿地都是碗片、盆片、玻璃屑，斑斑血跡，隱約可見；大概「好漢」之中頗有傷害。餐館裡據說「全部平安」，夥計們，懶洋洋地伸著腰，卻津津樂道昨晚驚險的鏡頭。

第一晚防禦雖然成功，但謠言愈來愈多了，說「好漢」糾集了更多更大批的隊伍，預備第二晚再來，爽性幹他媽的一個徹底，大有「不破樓蘭誓不還」之慨。每一個人面色青青，說：「往後的日子不好過啦！」

一個政權的消滅

在亞依淡警察局的布告櫥裡，貼著一張布告，略云：

自駐軍撤退，地方行政陷於紊亂，本會為維持治安起見，爰由當地各民族組織代表委員會，舉出負責人員，暫維秩序，以候接收。凡我居民，務宜與本會合作，共體時艱。並望照常生活，勿自相驚擾。近日飛機轟炸本市，居民多有死傷者，茲限自即日起，全體住戶一律升懸白旗。以示無抵抗，事關安全，各宜凜遵為要。

各民族治安維持委員會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說實話，幾天來，我們確實在過著一種昏頭昏腦的生活。首先是炸昏了，其次是搶昏了，再其次是謠言滿天飛，兩個耳朵又搞昏了。每天在那狹窄的街上，從早到晚，莫名其妙地擁塞著成千成萬的人，沒有目的，沒有希望地你看我，我看你。乖的趁交通未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翻山爬嶺，或乘船渡海，身家性命付之天命，倒也爽快。報紙於轟炸後勉強再支持了幾天，終於看看情勢不對，自動停版了。那些平日高談抗日救國論者，大約也都已溜之大吉，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們只是在黑暗中亂摸亂撞，跟謠言結了不解緣。

這些謠言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壞的，加油添醬，誇說日軍長驅南下，已越過吉礁北部，正朝亞羅打雙溪大年猛攻，紅毛兵一敗塗地，潰不成軍，本市失陷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另一種比較好一點，說英軍得到大批援兵，正在拚命反攻。——不過，總之，這只是謠言，看樣子，壞的成份佔八成。膽小的已經開始燒書燒舊報紙了。

在有意無意之間，也還有另一種謠言傳出來，說本地各民族正在商議組織一個治安維持會，準備於新政權未產生之前，暫時接管地方行政。我們以前在國內報紙上，時常看到日本軍隊所到之處，就有所謂維持會的成立，主其事者大半是一些親日份子，說得兇一點，就是漢奸和爪牙。但是這一次的維持會，憑良心說，卻並不是由什麼漢奸爪牙之類人物來組織的。維持會諸公，似乎真心想替居民服務；他們臨時組織了一支義勇軍，負責治安，一方面以威迫利誘的方式將「好漢」們手裡的槍枝全部繳了過來，「明火執仗」的事件自動絕跡，居民晚上可以好好睡覺，不必再敲洋油箱了。其次他們又設立了許多急賑站，免費施米、施粥、施醫藥，使劫後餘生的老百姓，還不至受飢受餓，總算是一場大功德。同時為了安定人心，他們又用各種文字寫了許多報告，張貼在警察局布告櫥裡。上述布告，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看了布告，大家心裡雖然比較安定了，可是其中「升白旗」一項，在居民眼中，倒還是新鮮的把戲。飽經憂患的人們，他們認為舊主人既已離開，新主人登台，自然應該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他們的意見倒很能夠代表一般中立派，換爺換娘不相干，只要誰有奶就算了。比較看得嚴重一點的是華人，尤其是一般知識

份子，他們說升白旗就是等於投降，是一種恥辱，但是他們不願意投降，至少他們還沒有投降的意識，所以反對升白旗。這兩派人也偶然來個爭論；至於商人呢，卻大多數傾向前者的主張。

然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白旗終於升起來了。因為人總是怕死的，何況認真說，紅毛撒了爛污，要叫棄兒們頂缸，道理上也講不過去。好得做一面白旗再簡單不過，也花不了幾分錢。

但是日本飛機仍舊繼續來炸，似乎並不曾因升了白旗而停止；也許是他們在高空看不清楚，於是維持會又再貼出布告，叫市民改升大一點的白旗；他們又在關仔角大草場上，升上了一面大得出奇的白旗。

白旗升上之後，象徵英國一百年來統治本嶼，已經壽終正寢。——那些老早秘密撤退南下的歐洲人，據說到了星加坡，曾受到星洲總督的熱烈歡迎，可惜他們並沒有想到留在後方的孤臣，真是痛心疾首，氣憤填膺，而後來勝利進駐的日本新主人也夠幽默，還要拉他們上電台去廣播「紅毛遺棄了我」一類的題目。

在眾人攘攘之中，忽然不知從那兒鑽出了一個日本人，自稱「廣島少尉」，在亞依淡一間華校裡堂皇地辦起公來。學校前面也貼了一張布告，叫市民有什麼事情儘管去向他接洽。

一星期後，頭戴鴨舌帽，身穿黃制服的「大日本帝國皇軍」在街頭出現了。本城歷史於是乎開始踏入了一個新的，但是可怕的階段。

接收種種

關於檳城如何向日本人接洽，及日本人如何接收本城，在當時言，一向諱莫如深。負責「獻城」諸公，也從來不肯將真情洩漏出來；他們有他們的苦衷，我們是應該加以原諒的。但百密一疏，總有或多多少少的秘密漏出，以下所記，就是一點接收前後的鱗爪：

到檳城升起白旗的時候，所有英國人、歐洲人，以及白皮膚的先生太太們，早已統統溜光了。駐軍於破壞大部份軍火、軍事設施後，也隨著南撤。真空時期，消息混亂，前線戰情究竟如何演變，完全像蒙在五里霧中。似乎在某一天晚上，我們曾隱約聽到遠遠有一陣陣的礮聲，不很激烈，卻很有秩序地逐漸輕下去。到天光大亮，礮聲即寂然不再聞。翌日下午，市面上就盛傳日軍已佔領吉礁北部重鎮雙溪大年；英軍據推測，大約已沿鐵路線撤退，他們一路並沒有什麼抵抗，雖然在霹靂州境內，也居然出動了坦克車硬繃繃打了一仗。

治安維持會成立之後，第一件大事是如何設法和駐在雙溪大年的日軍司令部取得聯絡。英人撤退之先，把北海電力供應站破壞了，以致無法從無線電裡通知日軍。而日本飛機不管市區已變成墳場，仍天天來炸，委員諸公祇好硬著頭皮派人到雙溪大年直接去和日軍接洽——意思要請日軍派一隊軍隊來檳城負責治安（註）。但是，派誰去呢？這個問題，真正傷透了諸公的腦筋，最後只好由每一民族中公舉一位代表，即是說：華人一位，馬來人一位，印度人一位，及混種人一位，另外還找了一位翻譯——是一個台灣人，「大東亞聖戰」剛開始，英國人就把他送入監去，現在又得從監裡恭敬地請他出來，陪同前往。這幾位代表，雖說是硬著頭皮，不得不「勉為其難」，他們內心之惴惴不安，也大可意料得到的。因為「大日本皇軍」的作風如何，口味如何，都是一個未知數。何況平時報紙上，這些蝦夷武士在中國大陸燒殺姦淫無所不為的傑作，早詳載無遺；那麼，代表們雖去求降，吉凶就難料了。

其時陸路交通斷絕，代表們祇好坐著舢舨船從海路去。路程艱辛不必說。總算冒著萬險之後還能夠平安回來，十幾萬翹首待望的市民焦急地想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點安慰，而據代表團長報告，他們會見日軍司令的情形略如下述：

日軍司令對於代表團能不辭艱苦前往請求「皇軍」早日駕臨檳城保護市民，深為感動。「帝國」此次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新秩序，不惜與「米英」帝國主義國家作戰，凡我亞洲人士，務須一致起來響應與協助，俾能早日完成聖戰目的。當茲軍情緊急，尚不能抽調部隊前來本城，希望維持會繼續暫維治安，以待皇軍之來。至於飛機轟炸，因皇軍尚未知悉英軍已撤走，今後當飭其停止炸擊，望以此情轉告市民。……

至於代表們怎樣會見日軍司令，以及他們對「皇軍」印象如何？大家似乎都守口如瓶，一字不提。祇知道維持會已聘請那位台灣籍翻譯員擔任兩方的聯絡，以便彼此通問。

我們常在歷史上看到每當一個政權消滅後，那代之而起的新主人，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臉，的確使人側目。檳城的居民，雖民族複雜，可是生於斯，食於斯，居於斯的人，也算不少。他們在十二月八日之前，誰也不曾預料得到以大英帝國的強盛，一百年來根深蒂固的統治，竟會在短短幾十天功夫拱手讓人；這種意外的變化，真太激動人了。

對於舊主人的一走了事，一般人多少有點酸溜溜的感覺。熱愛祖國的僑胞，鑒於當局對抗日工作總算還給予相當自由的，尤其覺得不勝其今昔之感。滿口洋話的仁兄呢，他們惑於舊主人平時拍肚拍胸的保證，諾言，到此也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他們現在倒不再依戀過去，祇是心中忐忑不安，而且摸不準新主人的脾氣，不知道會不會尊重他們？說到像亡國史上那種慷慨殉節，不願列入二臣傳的烈士，自然是寥若晨星了。

所以從這十幾天來的事變中，我們很懷疑所謂「百年樹人」的苦心，用「矢勤矢忠」的角度來看，會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作用。

但不管怎樣，他們對於未來的新主人，一樣並不十分歡迎，那是可以斷言的。

註：據松川先生〈檳榔嶼淪陷史略〉一文中說，代表們和日軍接洽地點是吉礁高勝武拉，不是雙溪大年，今錄此，以供參考。

亂世英雄

在前幾篇報告中，我曾對檳城自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起至它失陷為止的情形，約略地描繪了一個輪廓。可是我卻遺漏了一項重要的事實，現在就乘新

政權尚未產生之前的空隙中，來稍微補寫幾筆。

亂世出英雄，是歷史定例。檳城在這次大混亂中，雖其規模還說不上與前朝史實媲美，然而「英雄」們倒也出了不少。祇是我這裡所說的英雄，既不是那些拿起大刀，擎起長槍的英雄豪傑，也不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師謀士，而是指一些乘轟炸掃射，民心惶惶之際，從中混水摸魚，因此起家的好漢們。

從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開始，檳城人命、財產上的損失，這筆賬是無法估計的。有許多人，眼巴巴望著他的家人連同屋子葬身於熊熊火光中，數十年積蓄與事業在幾分鐘裡面全都毀滅；也有許多人自己逃得性命，但孑然一身，不知何去何從。這幾天真是檳城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日子；一般人事前毫無準備，毫無訓練，以致炸彈才下，便像沒有控制的野馬，狼突豕奔；在那千鈞一髮的當兒，人們顧得了自己的命，已算萬幸，身外之物，還管他什麼娘呢？

但是，也儘有不怕死的好漢，認定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於是日本飛機前腳剛走，他們便成群結黨蜂擁而出，在一片瓦礫之中，尋找獵取的對象。

萬物之中金為貴，所以最先光顧到的，便是金舖。據說有一間金舖，剛運進大批金條，好漢們撞門進去，翻箱倒篋，祇揀金條搬，他們隨身帶著麵粉袋，麵粉袋裝滿了，便往褲袋衣袋裡塞，臨走還將一包打便的金首飾，順手拋給一個正在店門口徬徨的丐婆。那位丐婆苦了一世，驟來橫財，還不曉得怎樣應付呢。

其次，洋貨店也是好漢們光顧的目標。洋貨店裡有的是名貴的金手錶，自來水筆；綢緞綾羅，日常用品，一應俱全。其中歐洲人經營的頭盤商，恰像開了天窗一樣，誰只要有膽量，儘管可以大方地到裡面揀心愛的東西拿。因為東西太多，好漢們頗懂得「大秤分金銀」的道理，你搬你的，我搬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得其宜。有汽車的，甚至出動大型羅里車，估計一車子洋貨，就等於開了一間洋貨店。亂世之中，各人生活無著落，搶到多少，不啻給你幾年溫飽，何樂而不為？

此外，好漢們也注意到糧食。英國人在本城屯積的米糧，數量頗大，他們本是準備留在緊急時期用的。米糧是一種笨重的東西，英國人撤走時，既沒辦法運去，又不可能毀滅，現在倒成全了好漢們。不過搬取米糧，大都限於有車階級。這些有車階級組織嚴密，行動迅速，在幾天之內就從米倉裡搬掉了幾百包，但存米依然如山積；以致搬到後來，大家索性不要了。

英軍空軍總部，裡面貯藏的物品，多得使人不敢想像。有許多東西，外面是永遠買不到的，如今卻便宜了附近鄉民。紅毛兵平時並不怎樣慷慨，這次明知搬不動，落得做人情，居然鼓勵鄉民儘量去搬。因為留下來給日本矮子享受，未免太那個了。——後來日本人一到，曾嚴厲徹查那些搬走的東西，而且因此逮捕了許多人，要算是這場搬物運動中最倒楣的了。

其他大大小小，搶掉的，搬掉的，難以統計。白天不夠，繼之以夜晚。鄉下人只見一車子一車子開進村來，卻不知道車裡都裝滿了好漢們的勝利品。眼紅的便獨個兒溜進市區，也想撈他一下子。但是個子瘦弱的人究竟吃虧不少，因為到你獵取到手時，街上身強力壯的好漢，已虎視眈眈，一擁上前，把你辛苦撈來的東西輕輕奪去，而你祇有眼睜睜看著他們，奈何不得。

搶到第三天，市區內所有大商店，都是空空如也，倖免於難的店家，老板們祇好硬著頭皮用重金雇人看守。有一家金店，就以每人一百元一夜的代價，才保全了「半壁江山」，可是損失也終於免不了的。

只有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對著喜氣洋洋的英雄們，自嘆弗如。其後秩序略定，街頭格像雨後春筍地興起來，攤上貨品華洋各色，應有盡有。這些貨品的來源，大概只好去請教英雄們了。

日本投降之後，我們在戰前窮得一日難顧三餐的朋友們，竟神通廣大，做起什麼闊佬來。其中頗有一部份人，他們發達的基礎，原是在上述時期內奠定的。然而正像中國的老話一般「三兩黃金四兩福」，倘使你相信命運的話，那也是他們的命該如此，你又自怨自艾做甚？

「皇軍」登岸側寫

英軍於十二月十七日撤走，日軍則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進駐本城，前後恰好相隔了一星期。（註）

檳城民眾對於大日本皇軍的威名，早已如雷貫耳。從中國逃難出來的人，斷斷續續地把日軍在中國的一切暴行，報告給海外僑民；日軍打進南京城的那一次大屠殺（死者廿五萬人），大可以和歷史上有名的揚州十日記媲美。因此日軍尚未進城，敏感的市民惶惶然趕東趕西，忙著替自己的安全想辦法。甚至於舉家遷往深山裡的，也不乏其人。他們不但怕「殺」，尤其擔心女眷們的命運；有經驗的中國老客紛紛勸告姑娘小姐們躲藏起來，那些在中國小城市或鄉村裡曾經發生過的恐怖事件，在他們腦海中依然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

所以當日軍上岸的那一天，街路上絕對看不見一個女人，不管是老婦或少女。

據後來目擊日軍登陸的人補充說，日軍上岸時每一個兵士都荷槍實彈，槍上插著刺刀，亮晃晃地，踏著衝鋒式的步伐，一下子佔領了海邊一切重要建築物。

關仔角第一面「太陽」旗隨著升上旗桿，「彼南」歷史開始；原先那面古老的 Union Jack 似乎早已被人撕成一條條的散片，毫無生氣地躺在地上，任人踐踏。

日軍上岸時有沒有地方人士去迎接，或由維持委員會派人歡迎，不得而知。祇曉得日軍司令事後很生氣，怪華人竟沒有派出一個代表，維持委員會的華人委員被飭令晉謁日軍司令，很受著一番難堪的訓斥。

這一天檳城變成一座空城，只有街上爛得已經發臭的腐屍，似乎就是唯一能夠歡迎日軍的人物了。

檳城市民還是第一次欣賞到穿著制服的日本兵士。粗看起來，日本兵士和平常人並沒有什麼兩樣。人人說日本人生得矮，但第一批上岸的兵士都是高頭大馬，倒像我們中國北方的大漢般。長官的服裝很講究，穿著筆挺的綠色軍裝，頭戴闊邊鴨舌帽，腰佩長刀（指揮刀），足登長統皮靴，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像煞有介事地。下級兵士比較寒酸相，上身只有一件短衫，一條褲子也很不起看，頭上戴的鴨舌帽和童子軍帽差不了多少。每一個兵嘴唇上都留著兩撇細髭；倘若仔細看上去呢，那就不難發現這兩撇細髭，正是東洋人的特徵，也足以象徵武士道的精神。

日軍一登岸，最活躍的是一群台灣人。英國人未退之前，他們還是牢獄裡的囚犯，如今一個個像出籠小鳥，東西南北，大肆活動。他們都會說日本話，自然佔盡了便宜。狐假虎威，檳城人士無不側目而視。然而信不信由你，第一批開到本城的「皇軍」，竟是道地的中國貨色。他們中間很少有真正的東洋血統。據說這些兵士都是在日軍圍攻廣州時投降的中國俘虜，他們會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或客話，日本當局把他們訓練後，即派作南進先鋒隊，真正的「皇軍」還在後頭呢。日軍如此做作，無非是利用中國人當礮灰，但軍隊裡控制得很厲害，所以這些「中國」式的日本軍隊雖明知被人利用，也無可奈何。後來，他們又被調上前線，在進攻星加坡一役，聽說全軍覆沒，少有生者，此是後話。

以檳城來講，假使所傳不虛，那麼我們倒反要感謝這批冒牌皇軍。因為在民族關係上，他們到底還算是中華同胞，所以我們先前所恐懼的「南京事件」，結果並沒有重演。一方面，大概由於檳城是一個城市，中印巫⁸各民族雜居，日本人不得不故意裝得正經點，無論屬於那種理由，歷史上勝利者所謂「三天洗城」的老例，總算豁免了；但馬來亞其他地域是否如此，當時卻不敢確定。

下

「皇軍」以檳榔律四坊樓為總部，太陽旗高升屋頂，那個豬血似的紅印，在陽光下閃閃飄動，頗能吸引路人注目。

說到檳榔律四坊樓，倒也有一段歷史。這是英國人新建不久的四層大廈，在叢爾小島的檳城，要算是最偉大的建築物了。舊主是一個土生峇峇⁹，原是一座紅磚砌成的二層洋房，凡經過檳榔律的人，大概總會不由自主地對它瞟一眼。可惜子孫無福，偌大家產在不景氣打擊下終於渡讓給殖民地政府，連地帶屋子，只售二十五萬元叻幣。英國人先把原屋拆掉（費時三月），再重新改建，前座是警察總局，後座作為職員宿舍，由星洲某著名建築商承建，全部工程，花掉一百五十餘萬元。

但英國人享受不久，就拱手讓給日本人，恰像替日本人建造似地，如今正好借此發號施令，而第一批佔領本城的日軍，就駐屯在這大廈裡。這個時候，市民

大都遷移到鄉村去，少數住在市區附近的市民，白天緊閉門戶，等閒不敢到街上去；不得已出門，祇能利用後門進出。晚上街上漆黑一團，死死沉沉，只有全副戎裝的東洋兵，拖著沈重的皮靴，在馬路上發出橐橐之聲，這種偶然劃破寂寞的靴聲，似乎更加深了夜晚恐怖的氣氛。

不過，當然也有敢出來溜溜的人，尤其是馬來人和印度人。在他們心目中，彷彿日本人的敵人只限於黃皮膚的中國佬。至於非華人，則不僅日本人不會把他們當作眼中釘，甚至還大加青眼，而使他們受寵若驚。其中印度人的態度還比較矜持，至於華人呢，即使在路上碰到東洋佬，也一概給他一個不睬。

老於世故的前輩，覺得這種現象對人很不利，開始擔心著未來的安全。雖然如此，華人內心的敵愾，始終不容易洗除。也許因此，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們所吃的虧也最大。

檳城新主人登台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釋放監獄犯人。那些戰俘——如日本人、台灣人，早已由維持委員會放出來了，而且都一個個身據要津；其他罪犯，按照國際常例，一個新主人的登台，就是等於舊主人的消滅，所有舊政權一切法律，自然也跟著失去效力。因此日本人的釋放犯人，一方面是表示著他的慷慨，同時也含有下馬威的用意；似乎從那時候起，檳城監獄就只空過一次，此後直到日本人滾蛋，牢獄裡總是擠得滿滿的。

第二件大事，便是清除街路上的屍首。日本飛機狂炸十多天，死了很多人，屍首暴露街路上，臭氣薰天，日子一久，個個都已面目全非，爛得不像樣子了。日本人清除方法確有一手，他們驅使抓來的英國俘虜替他們搬屍首，將屍首集合一處，然後澆上火油，一把火燒掉，倒是一個既簡便又衛生的妙法。有時候英國俘虜不夠用，那麼，只要在路被東洋佬瞧到任何男人，就立刻有被拖去搬屍首的危險。東洋兵擎著裝上刺刀的長槍，在旁監視，比皇皇文告還來得有效呢。

白皮俘虜在這幾天裡大概是他們一生中最難過的時候。因為這些俘虜，有的是以前殖民地的文官，有的是派頭十足的紳士、醫生或律師，更有的是平時吃慣牛油雞蛋的勇士，他們大部份因為來不及逃走，結果被東洋人截住了；現在卻在刺刀尖下勉強幹起他們最不願幹的下賤工作。而且最難堪的，他們更須在旁邊站滿黑皮膚、棕皮膚、黃皮膚的亞洲人面前接受東洋佬的命令，而不敢反抗；則同

幾星期之前還是當地主人的尊嚴對比起來，其心理上的變化，也真是一言難盡了。

宅心仁慈的人對於某一位以前曾經救活過不少人命的醫生，更不禁生出同情之心。但是他們在東洋兵的刺刀下，一樣毫無辦法，而愛莫能助。

所謂白種人的優越感，到此確已被徹底粉碎了！——這是一般人的共同看法。

註：也有人說是在十二月十九日開始登陸的，當時因在混亂中，究竟那一天登陸，似乎沒有見證。

[*編者註]：馬來人(Melayu)，通常簡稱為巫族、巫裔。已故作家吳進(杜運燮)在〈娘惹〉文中如此釋名：「馬來由也寫作巫來由 Melayu，因粵語『巫』音 Moh」，此說相當合理。跨文化的草民式音譯情形，在大馬相當普遍。

[**編者註]：東南亞地區最早期的華人移民，可追溯到明代，以福建和廣東籍居多。英殖民政府在檳城和新加坡開埠之後，華僑劇增，但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2:1)，許多(福建籍)男子娶了不諳漢語的馬來女子為妻。其子嗣用閩南語語彙和語法，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峇峇馬來語；同時又保留了華人的節慶文化與部分生活習俗。這些「三代成峇」的土生華人，主要聚居在馬六甲、檳城、新加坡等主要的英殖民城市。男人稱作「峇峇」(BaBa)，女人稱作「娘惹」(Nyonya)。娘惹一詞，必須以粵語或閩南語來唸，才能讀出 Nyonya。

知識份子的徬徨

這裡所謂知識份子，不外是指教師和新聞從業員兩種人；尤其是前者，在這次混亂中可真不大不小栽了一個筋斗。

我們要特別提起華校的教師，因為他們的犧牲較之其他民族學校教師的犧牲更慘更重。有許多教師，當事變之初竟不曾撈到一個子薪水。日本向英美宣戰是十二月八日，此時恰在華校考試期間，接著日軍席捲馬來亞，檳城在一星期內淪

陷，匆促之間失去聯絡，連最後一個月的賣命錢都不曾領到。有的則爽性把教師薪金扣留下來移作別用，儘管教師痛哭流涕、叩頭、稽首，一毫不能改變他們的心腸。

現在再來算這筆賬，似乎已有明日黃花之譏。而且在兵荒馬亂中，各人祇顧自己安全，那有下井救人的道理？可是華校教師大多數平時兩袖清風，毫無積蓄，在緊要關頭中又給人打了一記悶棍，其窘迫之態，也大可以想像得出來。所謂「急急如喪家之犬」，大約是此時此地華校教師的最佳寫照了。

然而生活照舊要過的，飯也照舊要吃的。教師們雖然窮，到了家國破碎的當兒，也祇得勉為其難，盡他們的人事算了。不幸做了知識份子，文不能安邦定國，武不會殺雞宰牛，拿慣粉筆兒的先生太太們，既不屑去做像亂世英雄們「大塊秤金銀，大碗分酒肉」的勾當，就是那種捲起袖子，紮起褲腳的估俚⁸雜工，也敬謝不敏。那時候的教師，還是所謂「穿起西裝，掛起領帶」的白領階級。好像身為文化人，就有一種尊嚴似的，現在卻要他把西裝脫掉，領帶撕下，跟勞動大眾一樣當起赤腳大仙來，可真難倒他們啦。

幸虧最初幾個月，由於日本人限制銀行提款（每人每月祇准提取六十元），一般人的手頭緊，不大願意隨便花錢，倒形成了一種「通貨縮緊」的現象。生活程度低，窮教師雖瀕於吃盡當光的邊緣，還總算不至於餓死。其時知識份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擺攤頭。家裡倘有什麼吃的用的，都盡可能拿出來陳列在街頭，博個什一之利。教師擺頭彷彿還是檳城歷史上第一次；所以初次出馬，大家臉上都不免靦靦覷覷地，有些畏縮。做生意要有勇氣，臉皮自然越厚越好，知識份子厚不起臉皮來，他們的生意成績可想而知。但做了一兩星期，或者為了生活的鞭策，大家也漸漸習慣了。客人上來，照樣能夠笑臉相迎。有時候，碰到以前教過的學生，而今成了主顧，那麼也只好收拾起以往課堂裡那副尊嚴的面孔，和他們打打交道，說說閒話。糟糕的是知識份子雖熟讀孔孟之書，可是前代的聖賢們，並不在論語孟子裡告訴我們當小販的道理。「士而兼商」，大學中果真應該增授「生意經」一門功課了。

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知識份子都改了行，比方從事新聞事業的朋友們，平常在報上慷慨激昂地大發其抗日偉論，而今東洋人虎視眈眈，就成了肅清的對象——

還不算是第一等的對象——早已遠遠地躲開了，不敢在街頭露面。還有少數「勇略」過人的文化人，畢竟是神通廣大，不知怎樣竟能混進日本州政廳、憲兵部，居然頭角崢嶸，飛黃騰達。其中也頗有幾個不凡的女性，從教書匠地位一躍而為「彼南紅人」，傲視輩儕，使人不禁回味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意義來。

可惜多數教師，他們始終被「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觀念沖昏了頭腦。「大東亞聖戰」之前，他們著實表現了先知先覺者的精神。購到救國捐，他們總是十巴仙廿巴仙的按月捐出；此外尚有難民捐、寒衣捐、醫藥捐、種種奇奇怪怪的捐款名目，都有他們的一份。記得武漢合唱團到檳城來，文化界幾乎全體總動員，不消說荷包又減輕了許多。這些錢究竟去了那裡，他們固然不知道；也決想不到將來會有一天自己需要人救濟的時候，而竟被賞以閉門羹。

這裡，我們很難把當時知識份子的全部實況公布出來。因為當第一枚炸彈拋下的時候，大家都如鳥獸般逃散了。從戰後的部份記錄裡，我們知道日本人登陸不久，就大舉圍捕「抗日份子」——其實是文化份子。教師一方面要逃避日本人的「圍剿」——也有「彼南紅人」充作內線——一方面又要顧慮到個人的生活問題，家庭的生活問題，茫茫然，又惶惶然，這種滋味，局外人就難以領會了。

所謂「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作先生。」夏丏尊的名句，當真成了「彼南時代」知識份子的讖語了！

[*編者註]：「估哩」(coolie)，或譯作「咕哩」，是東南亞華人對「苦力」的慣稱。

新貴人

照日本人的看法，他們根本不承認有所謂「馬來亞」人。馬來亞化這名詞在他們眼中是毫不生動的。他們祇承認當地人民有華人、印人、巫人或混種人的區別。這些複雜的民族，從彼南時代起，自然都唯「大日本帝國」馬首是瞻。

各民族的待遇有幸和不幸：警方說日本人最恨華人，因為華人在舊政權時期抗戰工作幹得最起勁。至於滿口說洋話的高等紳士，他們當然不會幹抗日工作，但他們卻成了「親英」份子，也為日人所不喜；於是他們的命運，和「抗日份子」也就相差無幾。其次是印度人，日本人對付印度人，是用一種「殺雞儆猴」的手法，讓印度人從華人所受的逆境中去自己領會；一方面日本人想進兵印度，非得竭力拉攏印度人不可。那位有名的印度民族英雄「真德拉波士」，就曾經好幾次駕臨「彼南」向成千成萬印度人打氣，鼓勵他們參加印度國民軍，準備解放「祖國」國土。就這一點，印度人所吃的苦頭，較之華人真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講到馬來人，在最初一年的日人統治下，著實沾了不少光。日本人把他們當作「同志」。彼南的警察公開警告華人不要希望再倚賴外國人做「靠山」；他們對於新主人的一切措施，似乎都覺得新鮮。事實上，日本人在若干地方，的確故示寬容，讓他們高興高興。那些走不掉的馬來亞各州貴族，表面上和日本人搞得滿熱鬧的。

當馬來亞戰爭還在激烈進行的時候，東京的東條內閣忽然通過了一條議案：所有在「皇軍」解放的東南亞地區，華僑財產將照舊保存，不被充公。據說這條議決案，是為了南京汪精衛的請求，目的在安定華僑人心；其後就表面上看，日本人真正做到這一點。「彼南」被充公的財產都是屬於舊政權的東西，或是英美等國人民的產業。華人建築的高樓大廈，仍舊由華人住著。——不過，日本人雖狡猾，並不能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他們盡可以用其他方法來敲詐華人，例如五千萬元奉納金即是。此外，日本人一到「彼南」，就凍結了「彼南」全部銀行的存款，這一筆數目可也不少。日本人要用什麼，一紙令下，無不立備。而且英國人留下的房子很多，足夠日本人的需要，他們又何必故意要去充公華僑的產業呢？

筆者在頭幾篇報告中，曾約略提到了「治安維持委員會」這一組織。自從「檳城」易名「彼南」，維持委員會解散，為迎合「皇軍」意思，又著手組織了各民族協會；如華人的叫做華僑協會，印度人的叫做印僑協會；「彼南」四大民族——華、印、巫、混種——就產生了四大協會。四大協會都直接向州政廳長官片山三省郎「閣下」負責；每一協會由會長、若干委員等分擔職務。日本人通過協會，控制了全彼南的人民。

華僑協會的地址曾搬了幾搬，最後好像是搬在一家佛堂裡，那裡修竹綠茵，

一片清靜，再加上從佛堂裡噴出的繚繞煙霧，更顯得古色古香；以之作為協會諸公促膝談心的所在，誠然是再妙不過了。貴人們在舊政府時代，一向鬱鬱寡歡，如今脫穎而出，一躍登上寶座，其得意忘形炙手可熱的一副氣概，也確是筆難盡述的。——然而，片山省太郎閣下何以單獨對這幾位垂青，當然並非沒有理由的。第一，那些新貴和日本人，彼此感情素稱融洽；有這一層關係，再加上他們在當地的聲譽和地位，雖不能算是第一流人選，也將就過得去了。至於他們登了寶座，一方面固然可藉此過過官癮，洩洩氣，而同時又可利用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混他一下子；所以他們的「寶座」壽命雖短，但也不會虧本。片山省太郎閣下只要「紅人」矢勤、矢忠，禮數週到，其他的事，一概不問。

可是他們在同胞面前，總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還要訴苦：為了做官，物質精神犧牲很大。因為他們也常常受到「閣下」的閒氣，好不好就是一頓夾頭夾腦的臭罵；但他們受慣了，就安之若素。何況他們也有罵人的機會呢。人家背後譏笑他們，他們泰然自若地說：「沒有我們，你們早被日本人殺光了！」

刺刀下的歡笑

一九四二年的初春，在炎熱的陽光下緩緩消逝過去。滿身流著臭汗的人們，恰像低沉的氣壓一樣，窒息，苦悶，而又說不出其所以然來。他們每天必須面對許多稀奇古怪的場合，甜酸苦辣，悲歡離合，其滋味誠然是不好嘗試的。

自從皇軍光臨，半年之間，已將彼南市民的傳統生活習慣改變得不成樣子。西曆——1942年在日曆上被塗沒了，代之以「昭和十三年」的字樣，馬來亞時間被改為東京時間；英皇喬治六世也在人們嘴邊滑脫了，現在他們必須忠於「天皇陛下」。無線電台廣播出來的歌曲，不再是那些充滿色情的外國小調，而由武士道的東洋進行曲代替了。自然，在倫敦印刷的老虎鈔票，市面上也一天天少起來，軍用票滿天飛，在市民心目中反成了一種新奇的刺激物。

這些改變，由於當地人民的敦厚賦性，也還能夠勉強忍受著。

但是四月裡大肅清的舉行，使他們開始明白新主人的作風與舊主人完全不同，至少對於處理治安問題上，新主人的看法與一般人大相逕庭。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皇軍統治的三年八個月中，無疑已構成為一種極強烈的觀念。這個，雖起始祇有華人感覺如此，但不旋踵其他民族也逼得非承認其準確性不可了。

其次，日本人也是出名的刮龍專家。東條政府雖通過一條「不充公華僑產業」的議案，可是當「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大將進駐昭南島後，他第一步即施出劊子手的看家本領來大殺華僑，第二步則勒令全馬華僑對於舊政權時代那種激烈的抗日行為必須以實際行動來贖罪。所謂以實際行動來贖罪的結果，即發動了有名的「五千萬元奉納金」。想來這件事大眾印象猶新；就當時言，參加五千萬元奉納金的幾位主角，以及這幕戲如何在秘密中進行著等等，真夠得上說是「嘆為觀止」。由彼南州派去的華人「代表」，在全馬奉納金會議席上拍胸保證彼南可以負責「七百萬」元；這一保證後來害得許多華人傾家蕩產；然而也有些人，反因此而撈進了許多樹膠園、房產。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獻金」典禮，地點在昭南島皇軍總部，儀式也進行得滿滑稽的。忽怒忽喜，半推半就；其實自始至終，早已安排好了。首先是「全馬華僑代表」呈文馬來亞之虎，自認不是，為表示贖罪起見，情願無條件將全部華僑產業獻出，請大日本軍政府接受這誠懇的要求。不過，大日本軍政府卻像煞有介事地加以拒絕了。於是代表們再上呈文，再請大日本軍政府接受其要求，因為「非此不足以贖華僑莫大之罪愆」。但第二次要求又給軍政府拒絕了。因此，全馬華僑，為表示感激「皇恩浩蕩」，而又沒有其他種方法證明其「誠意」，第三次呈文中就請軍政府接納華僑的一點點小意思「五千萬元奉納金」，作為犒軍之用。這一要求，算是在「馬來亞之虎」滿臉殺氣下接受了。蓋日本人雖愛錢，還要裝腔作勢，在華僑面前擺架子。祇是苦了那些代表們，摸不準矮子脾氣，又怕得罪了他，直到老虎點頭首肯，心上一塊石才放下來，而冷汗已不知流去多少了。

之後，恐怖統治表面上暫告一結束。哭喪著臉的市民，現在又得裝出笑容來慶祝皇軍的勝利了。日本人也夠刁皮的，痛打了你一頓，還要叫你哈哈笑。四月

六日陰影未散，四月二十九日的「天長節」又來，人們在刺刀下雖然不願意，但除了硬著頭皮隨其擺布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話說日本人一年中有所謂四大節日，天長節是第一個節日，又是「天皇陛下」的誕辰，他們看得特別隆重。那一天，家家戶戶必須張燈結綵，膏藥旗高升，主要交通中心，還要紮牌樓，入夜電光輝煌，皇軍列隊經過牌樓前，威風凜凜。人們百無聊賴，少不免隨和隨和，也跟著出來湊湊熱鬧。不料當矮子興高采烈之際，忽傳敵人潛艇進襲彼南近海，臨時施行全黑燈火管制，那些燈光燦爛的牌樓，立刻變成一座座寂寞的墳場，這對皇軍來說，未免大殺風景哩。

至於達到其他節日，如明治節、海軍節、地久節等，日本人也照樣強迫市民熱烈慶祝。在日本統治彼南的第一年裡，商店裡還有點貨色，借慶祝來調劑調劑購買力日益貧弱的商場，未為不可。可是一年年過去，物資缺少，商店門可羅雀，雖欲慶祝，也提不起興趣了。大概矮子也看出了其中癥結，由第二年起，已不再強迫市民紮牌樓，掛燈綵；慶祝地點移到電影戲院去，用「免費看戲」的招牌引誘市民進去鬼混一番，簡直不知所云。白天則集合了全體公務員、學生、教員、醫院裡的醫生、看護助手、前面由銅樂隊領導，大吹大擂，遊行一匝，算是慶祝的最大場面了。身著白色長套的醫生護士，或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參加吧，心裡滿不高興，而在皇軍監督下，也只好服服貼貼，跟在後頭吶喊。這種進行有時頗能引動路人注目，尤其是小孩子，裂開了嘴在旁拍手歡笑。

話雖如此，生活一天天艱難起來，白米一千冬*黑市要買到兩百多元了。在生活重擔下的人們，即使矮子怎樣壓迫他們裝出笑臉，也不容易收到美滿的效果呢。

[*編者註]：千冬 (kantung)，即「袋」，舊時代慣用的商品買賣單位。

日本語第一課

說到教育的問題，日本人確然並不比人落後；反之，他們的教育政策，或許比別人更徹底，更積極。

日本人的作風素來是說得到，做得到。既不像西方民主國家那樣地，還須在所謂立法會議裡提出二讀三讀，更不用像煞有介事地徵求誰的同意。例如州政廳還未成立之前，雖然彼南全部學校——不管是華、巫、英、印——關得像牢門一樣緊，但當長官閣下一聲令下，幾十間校門一齊打開，每天可以看見成群兒童跳跳躍躍地拿著完全免費配給的日文書籍，受著完全免費的日文教育。

在這方面，足見從扶桑三島來的統治者著實要比曾被希臘羅馬文明薰陶過的人高明多了。他們根本不必討論什麼教育馬來亞化的問題，也毫不關心那一種文字才是馬來亞的官方文字；總之，學生讀的是日本書，教師教的也是日本書，一切全是「日本」式的東西，自然「文化」也是「日本」式的；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一踏進學校大門，無非就是那些「啊伊嗚嚶啞」在作怪罷了。

本質上看，日本人雖做得徹頭徹尾，然而也不過比較爽快點罷了。因為他們也抱著一種觀念——除了竭力讚美其本國文字的偉大優美之外，並不想尊重其他民族的所謂「方言」文字。

反之，學校一開門，失業了將半年的各民族教師，倒像大旱之望雲霓，解除了生活上的壓迫。日本人怎樣去找這麼一大堆教師，在當時也頗費人猜疑。原來自從大肅清之後，知識份子人人自危，逃的逃，隱的隱，還敢公然跑出來承認自己是教師嗎？大概這些教師，在生活重擔的壓力下，在日本人的「威迫利誘」下，終於上了餌。至少有一部份，當他們第一天拿起日本書教導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時，內心一定很矛盾；因為無論怎樣解釋，他們已覺得暫時充當了殺人不見血的文化劊子手。這些當然是有良心的；也祇是限於少數教師而已，至於受慣長期訓練的仁兄們，你要拿聖賢大道去責備，就未免牛頭不對馬嘴了。

但是即使做日本教師，也很不容易。第一：自己不通日本文，怎麼教呢？那就非預先受訓不可。談到受訓，情形可並不簡單。年紀輕輕的小伙子，或生性聰穎的，學起什麼平假名片假名，還不覺其難，那些兩鬢斑白的老先生，或是連一個中國字都不認識的外國朋友們，卻不勝其負擔了。可是為了一個月區區幾十張

香蕉票，仍得拚著老命幹。

其次，那個一臉橫肉，兩眼朝天的訓練班日本教師，樣子也嚇得煞人的。上課時學生必須向他行九十度必恭必敬的禮，否則不問男女，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一位頗有名望的女教師，還做過舊政權時代的校長呢，竟被「矮子」當場賞過熊掌。據說從此之後，她變得瘋狂了，以後就不曾再聽過她的消息。

除了學校，凡是州政廳公務員，也當然一律須學習日本語文。日本人訂了什麼獎賞規則，你能考試及格，就可以加薪水，你得到優等成績，更可以跳級。香蕉票的價值雖是有限，倒頗能使熱中功名的紳士們拚命鑽研。或許他們存著一種幻想，以為「大東亞共榮圈」是根深蒂固了，你不學會日本文，這飯碗還靠不住呢。

民間的反應比較冷淡，有許多家長們，一面送子弟進學校讀日本文，一面卻在家延請家庭教師補習中英文。有一部份頑固的家長們，現在開始認識了中文的價值。大概他們自己在學習日本文的過程中，吃了不識中文的虧，也由於民族意識的勃發，迫使他們非對中文價值重新估計不可；這許多理由湊合起來，峇峇們也以能書寫中文姓名為光榮了。要說讀日本文的唯一功用，不妨就是如此吧。

然而本地人運用語言的技巧，的確是很使人吃驚的。有許多人才學了幾個月日本語，就講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尤其是憲兵部，海軍，陸軍裡做事的先生小姐們，「咕利格刺」，滿嘴「東洋腔」，完全擊倒了「西洋話」的傳統尊榮。聽說在四月裡一場肅清中，能夠說幾句日本話，不僅免了囹圄之苦，日本人還會把你當作座上客，請你參加「共榮圈」建設事業哩。

總而言之，在學習日本語日本文的競賽中，懂得華文的人是佔盡了便宜。那些平時只會講「愛皮西」的峇峇們，以驚訝的眼光目睹人家平步青雲，不免又眼紅起來。他們向來是看不起中文的，但如今也不得起勁地請教人家，問這問那。於是乎，在我們幼稚的心靈中，竟發生了一種「飄飄然」之感——認為二十世紀的中葉，華文將有它發揚光大的一天——因為，這是潮流所趨啊。

可惜，我們在當時確乎太幼稚了一點——原來人家的算盤早已打好了啦。

勤勞奉仕隊

利用賤價勞力，叫老百姓拚命流血流汗，算是日本人的拿手傑作。

此即「勤勞奉仕隊」之所由來。我們曾在「彼南」州沐過「皇恩」的人，除了那種「灌水」、「炮烙」的嚴刑峻法使人驚心蕩魄外，只要一提起勤勞奉仕隊，也照樣會引起「談虎色變」之感。

勤勞奉仕隊，是在皇軍佔領彼南州的第二年開始組織的。對象據說是年輕力強的所謂無業遊民。他們根據戶口調查，假如某人剛巧失業，在調查表裡填了「失業」或「無業」等字眼，那麼，他們的命運就被註定了。日本人是根本不管你的申訴或請求的，一被指定，毫無通融餘地。在極端的高壓力下，青年們呼籲無門，祇有摒擋行李，候命遣送。

第一批派出去的勤勞奉仕隊，地點是蘇門答臘，離開彼南州有好幾百里遠。他們要到那遙遠的異鄉去幹什麼事，既無從揣測，日本人也從不宣布。不過大家心裡有數：去時容易回時難，付之天命罷了。

所以他們雖然避過了兩三次的肅清和檢舉，仍舊不能夠逃脫劊子手的魔掌。至於這件事的進行——卻始終都在秘密之中，局外人簡直沒法曉得真相。日本人對於抽丁的宣傳，恰與報告「皇軍」輝煌戰訊相反。後者不惜工本，大吹大擂，前者則報紙上隻字不提；唯華僑協會在這件「傑作」裡，確也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到了第三年開始，皇軍又大舉抽丁，這一次是被派往暹羅去，建築那條有名的所謂「死亡鐵路」。據最近報紙所載，日人為建造這條鐵路，曾動員大隊英澳軍俘虜，但星馬一帶被強迫前去的華人也不在少數。《南洋商報·商餘副刊》還曾刊載過一篇九死一生者的報告，我相信每一個讀過那篇報告的讀者，對於日本人那種慘無人性的行為，決不會加以寬恕。可是就當時言，誰人不幸被抽去，誰人秘密失蹤，卻都諱莫如深。總之，凡被遣送到蘇門答臘或暹羅去的，大抵「凶

多吉少」，他們之中，很少有生還的希望。

一九四三年夏季，那時東南亞受到英美等國的嚴密封鎖；糧食情形一天天嚴重起來；日人沒法供養當地居民，挖空心思，鼓勵居民自己種植食糧。但彼南可供種植的地方太少，不得不利用對港大陸上的曠地。州政廳把這件事責成華僑協會，協會諸公因此大忙特忙；第一步派員勘量土地的結果，認為種植面積太小，無甚成績；祇有把「若干」樹膠園砍掉，方能獲得植糧的理想效果。他們把這意見貢獻上去，州政廳自然照准，於是馬上動手徵集壯丁砍樹膠。

所謂「若干」樹膠園，其實至少有幾千英畝。好在這些樹膠園原是「敵產」，棄置已久，早荒蕪不堪。問題是在：那兒去找這麼許多砍樹膠的工人？協會諸公不愧足智多謀，他們替日本人想出了一條周密的計畫，根據當時的戶口調查表，把全州分為十餘區，每一區包括十幾條街道，每一條街又至少包括百來家人家，凡家裡的男子，只要在十四歲以上四十歲以下，都須一律參加「勤勞奉仕隊」，違者重辦。每人「勤勞」期限是兩週。在兩週「勤勞」期內，還有「免費膳食」供給，及每天「五毛錢」零用等種種「優待」辦法。

然而，不管怎樣優待，當報紙上把細則公布之後，可真嚇壞了全彼南的市民！男子首當其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女人求神拜佛，希望丈夫子弟平安。乖一點的到處請託，送人情，或假裝生病；錢能通神，究竟佔了不少便宜；那些做自警團長的倒著實撈了一票。兩星期後首批勤勞奉仕隊出發，如此輪流替代，倒楣的每三個月中竟輪值兩次，直到你筋疲力盡，兩腳朝天為止！

拿蘇門答臘和暹羅鐵路來比較，這兩星期的勤勞卻算是幸運的。但其中仍不乏許多辛酸的故事。一位體格強壯的青年，第一次參加勤勞奉仕隊，兩週後回來，瘦得像一根柴，人們幾乎不再認識他了。這兩星期的工作，據他說來，就像上了刀山油鍋，在瘧蚊、瘴癘重重包圍著的膠園區域，吃的是惡劣不堪的蕃薯飯，喝的是色如咖啡的港水，白天在烈日下揮汗如雨，晚上成千成萬的蚊蟲向你猛襲；好便好，不好皇軍的老大棍子沒頭沒腦打，這個時候，他們才體味到「度日如年」四個字的意味來。

可是奇蹟竟在此時產生，有一種所謂職業砍芭人，到處向奉仕隊接洽生意。只要你肯捨得送他三四百塊錢，他們情願代替你的工作。這些職業砍芭人，多數

住在膠園區域；當地土著，生活習慣，不成問題。因此，從彼南派去的勤勞奉仕隊，樂得利用他們。日本當局只要湊足人數，至於接替與否，他們看得並不要緊。

不幸命裡註定是窮光蛋，那就無法可想了。彼南市中心一帶商店林立，壯丁也最多，所以這地帶壯丁，被抽次數也最多。區區小夥計收入有限，那兒去找三四百塊錢？於是他們只有拚著命幹，以至不支、病倒、嗚呼哀哉；雖有人敢向「紅人」提出抗議，然而「紅人」有皇軍作靠山，那裡會把他們放在眼裡呢？

勤勞奉仕隊的組織一直維持到日本投降才停止，其間送命、受傷、染病的，諒來不在少數；幸運的平安歸來，舊事重提，聽者猶不禁毛髮悚然。十年以來，滄海桑田，人們一場大夢睡醒，又似乎不再掛在心頭了，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物價高漲，等於香蕉票貶值。當然，說到香蕉票，皇軍初進城時著實吃香過。最初是一元蕉票對一元海峽票，其後比差日漸增大，到第三年每一元海峽票竟可換到香蕉票二萬餘元。至日本投降時再驟增至三萬餘元。日本當局曾儘量搜刮海峽票，同時嚴禁人民收藏，但「彼南」市民對「皇軍」信心一天天衰落，格外覺得海峽票的寶貴。日本人的命令，徒成一紙具文罷了。

可惜英人重回馬來亞後，雖宣布香蕉票為非法紙幣，依舊換回了海峽票，物價卻始終配合著日治時期香蕉票的比例，通貨膨脹的現象毫未減輕。人們空自貯積了幾十麻袋的蕉票，落得一文不值。十年過去，生活程度仍比戰前提高十倍，大概今後，也沒有恢復的機會了。這倒是當初「彼南」市民所不曾夢想到的。

組合內幕

所謂「組合」，其實是「統制」的變相。那麼，索性叫統制好了，為什麼偏偏喜歡咬文嚼字呢？原來「天下烏鴉一般黑」，日本人一到彼南立刻樣樣都「日本化」，前已有影戲院娛樂場所之改名，則「統制」兩字，自然也非「日本化」不可。何況矮子氣量，是出名狹窄慣的，怎肯讓你襲用舊政權時代的名稱呢？

事實上，舊政權時代雖有「統制」的組織，僅限於糧食罷了。那時候家家戶戶已有米牌頒給，男女老少，按牌領取米糖等主要食品。此外汽油亦在統制之列，唯受影響者祇屬有車階級。聽說歐戰爆發後，星洲總督湯姆司爵士以身作則，改騎腳車，目的在節省汽油。但民間乘汽車者仍多，好得無關民生，對於兩袖清風的窮小子，殊不值計較。

等到「組合」一出現，其範圍可就大了。不僅米糖主要糧食受統制，其他日用品只要日本人一看中，也難逃劫運。於是「香煙組合」，「火柴組合」，「煤炭組合」，「麵包組合」，「漁業組合」，「椰子組合」，「肉類組合」等，俱應時而興。這些組織，都隸屬於州政廳，由州政廳派員管理，大多數都是委派華人。因為華人擅於鑽營；「長袖善舞」，又素為華人特長，日本人將這件差使委託了華人，倒造成了許多人的刮龍機會。

每當某一組合成立，日本人必在報紙上——《彼南新聞》——大吹大擂誇說組合成立後對於市民怎樣有好處，物品怎樣能夠公平配給。日本人以擊滅「共產主義」為口號，然觀其籌設組合動機，倒像成了共產黨的同志了。而究其實，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在「彼南」州的市民，祇要一聽到「組合」兩字，就知道又是日本人的把戲。蓋某一物品一旦「組合」了，好的必先讓日本人揀去，揀剩不要了的，才賣給市民。所以煤炭一「組合」，煤炭就絕跡了，魚蝦一「組合」，市民只能吃一點臭魚臭蝦了，肉類一「組合」，則竟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慨。凡好吃的，貴重的，都盡給皇軍享受，祇有蔬菜一項，未蒙垂青。因為這種下賤食品，日本人是鄙視一顧的。再則倘蔬菜也來「組合」，市民只好吃「風」了，算是日人網開一面的德政。

然而另一面，許多主持「組合」的老爺，卻都撈了一筆外快。日本人的法令，瞬看雖像煞有介事，你如應付得法，仍能上下其手。以煤炭組合為例，煤炭一統制，市面上固然看不到煤炭了，但是每一箇月中，也間有一二次分配一點給咖啡店或食堂，「彼南」全市咖啡店食堂不下數百間，即以每間分得十斤計，亦有好幾千斤，「組合」官苟能運用心計，每間揩油一二斤，從黑市裡銷出來，這筆外快豈不大哉！其他香煙魚肉，均可作如是觀。故組合官作了幾年，無不腸肥腦滿，市民們受了虧，還啞子吃黃蓮，不敢則聲。

比這更不幸的，在未「組合」前，巴剎⁸小販，靠此為生，生活雖苦，尚無失業之虞。組合一來，全部歸給老爺，由老爺派員分發，小販幾乎全部失業了，偶有一二次輪到，於事無補。偌大巴剎，平時人煙稠密，喧囂熱鬧，如今恰像罷市一樣，門可羅雀，顧客稀少，小販們席地而坐，交頭接耳，津津有味地在研究「字花」，這也可算是受了組合之賜。

日本人搞「組合」，無非為了搜刮物資。「彼南」於皇軍進駐之前，物資不可謂不富豐，四面環海，魚鮮不可謂不多，但在日人拚命搜刮之下，加上爪牙們分肥揩油，食用品一天天短少起來，到了後期，連組合的生意，也難做了。報上也容易看到分配物品的通告。倒是那些組合官的架子，大得十足，尤其是和華人協會有點瓜葛的人，靠著協會的聲勢，窮形極相，在老百姓面前，狐假虎威。這種情形，我想凡身當其境的，總還能記得一點。彼南州有不少發黑市財的，「組合」亦是一種重要來源。故當日本人投降消息一播出，老爺們紛紛消聲匿跡，躲藏起來，那些組合招牌，也一塊塊被人扯下。可是吃過苦頭的市民，究竟舊恨難消呢。

焚書

焚書坑儒，是專制皇帝的拿手好戲。日本人既標榜大東亞共榮圈，為解放東南亞人民的自由而戰，照理那些古代束縛言論思想自由的暴政，是不會存在的。但馬來亞人民，對於日本人的這塊金字招牌——大東亞共榮圈，似乎已心照不宣，無論嘴面上說得天花亂墜，他們根據「蝦夷」島國的建國歷史，以及傳統的所謂武士道精神，在「皇軍」未臨之前，老早就惴惴不安，恐怕秦始皇的傑作，又要在本地重演一次了。

果然，《彼南新聞》出版才一週，本埠新聞版上即標著一條重要新聞，略云：
自登報之日起，限一個月內，將所有含有抗日反日及共產主義思想之書籍報

紙全部銷毀，違者重懲不貸。

日本人倒也是個爽快民族，不像別的人，還要一本一本，一張一張不怕麻煩細細算賬。「抗日反日及共產」這幾個字意義雖模糊不清，然而彼南市民眼睛雪亮；他們知道「共榮圈」一來，「反動」書報休想存在；所以即使當局不下令，許多人家早經在設法銷毀一部份的「違禁品」了。

算是一般文盲倒楣，不會看書報，祇曉得報紙可以包東西，書籍也可以賣錢，看見人家在焚書，他們反以為奇怪。有一位小販，從一間華校裡運出了一大手車的中文書籍，滿想鴻運當頭，發一筆小財，不料載到車水路，給「長頭毛」的爪牙——還是一位炎黃後裔呢——截住了，當街一查，發覺八十巴仙的書籍都是抗日傑作，這還了得！立刻人車一起押到憲兵部，在長頭毛鐵腕下，人被打個半死，書籍完全燒燬。這一事件的影響非同小可，日本人大發雷霆，認為華校都是抗日份子的巢穴，教師學生都是共產黨，加上爪牙們推波助瀾，於是在四月大肅清中，許多知識份子都被莫名其妙地檢舉了去。

其次，當局查究反日書籍的風聲一傳出，立即不脛而走，許多人家藏有書報的，紛紛大舉檢查，凡內容稍涉抗戰，或是屬於社會科學一類的書，幾乎難逃劫運。讀書人平日把書當作第二生命，眼見數十年辛苦積聚起來的精神食糧，付之一炬，怎麼不要痛心疾首呢？——這一個月，當真成了「焚書月」了！

但還有人存著若干幻想，以為反日親共的書報，固然不合日本人的胃口，至於其他書籍，例如講講科學藝術的，或是字典辭書一類，應該不成問題？就是秦始皇燒書，還保存了醫卜星算的著作。因此四月六日大肅清剛開始，「皇軍」挨戶搜查，大家為防萬一，還把金剛經、心經之類的佛典一部部搬出來放在案頭，當作護身符，滿望皇軍平時也哼哼「阿彌陀佛」的，至少會放過你了。那裡知道這些「皇軍」根本目不識丁，只要看見有一張紙，一本書，不分皂白，就對你一個巴掌，連人帶書，一起押走；（從此鴻飛冥冥，不知所終者，真多得很。）其時風聲緊急，再經人一渲染，那些自以為萬無一失的藏書者，不由得談虎色變；尤其是婦孺們，提心吊膽，不管三七二十一，逢書就燒，中文書固然燒，英文書也要燒，且圖眼前平安再說。如此一來，彼南的書報，可就遭了大劫了。最可惜是有許多絕版書，就在中國，也難買到，而今祇好望著那熊熊烈火，作一番痛心

的憑弔了。(筆者家裡，亦嘗收藏得許多珍貴的碑帖書本，以及先父生前所作詩文書畫，不幸在這一場浩劫中，也遭了池魚之殃。)

從此以後，彼南所存書籍，恐怕是寥寥無幾了。有價值有意義的出版物，更屬鳳毛麟角。秦始皇時代的文化浩劫，不想在彼南重演，使人深深領會到歷史教訓的可怕。精神食糧絕跡，知識份子幸而留得殘命的，除了一張頌揚皇軍德政的《彼南新聞》外，差不多終日處於窒息苦悶的氣氛中。當然，其中也不乏神通廣大之輩，竟能事前設法保藏，不過那究竟是少數罷了。

和平之後，出版界風起雲湧，由外地運來的新書，源源不絕。好像經過數年黑暗，又恢復到「文藝復興」的前夜了。但戰後通貨膨脹，書價比以前貴了奚止十倍？再說，那些絕版書及珍貴的書畫，似難在市上發現。新的文化雖然已在人類不斷努力之下漸漸孕育，漸漸產生，回顧遺跡，仍令人不勝其感慨。

地下工作者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的一天晚上，約莫「東京時間」十點多鐘，住在彼南市區的居民，突聞一陣巨大爆炸聲，聽見火光沖天而起，照耀如同白晝，經久不熄，膽小的人以為「老花樣」又發作了，紛紛逃避，一時秩序大亂……

翌日《彼南新聞》登出了一條新聞，說有一艘貨船不慎失火，發生燃燒，並無其他事故……云云。

但這條失火的貨輪，卻一連在港中燃燒了三天三晚，日本人也不想法去撲救；直到第四天，火勢才慢慢熄下去，船也終於沈沒海中。

當時這件事情的確引起一些人的驚疑，因為自從「皇軍」光臨，這還是第一次發生的意外。但報紙上的記載既略而不詳，而船在港中焚燒，外人更不能靠近去看個仔細。事過境遷，也就逐漸忘記了。

直到光復之後，從一位英國潛水艇長口裡，才知道那次焚燒，原來是一艘英

國潛水艇幹的傑作。那艘潛水艇從「彼南」南海區潛進港口，對準一艘日本運輸艦（並非貨船）發射了一枚魚雷，立刻引起爆炸。事後潛艇安然逃去，未受損失。

至於英國潛艇怎樣能夠在黑夜偷過封鎖嚴密的港口呢？據那位船長的解釋，是得到了當地地下工作者的幫助所致。

說到地下工作者，似乎當英國人撤退彼南之後立刻就開始組織的。英國人留下了一批「第五縱隊」，從事偵查皇軍的軍事秘密，那一次潛艇進擊得到「第五縱隊」們幫助，似乎毋庸置疑。不過，從事地下工作的人，並非完全接受英國的訓令，尤其是到了後期，那些專門破壞皇軍設備和工作及暗殺軍政要員的「兇手」，更與英人無關。如雪蘭莪州的一位州長官「閣下」菊池慎就死於地下工作者之手。可知這種組織，非僅「彼南」，即整個馬來亞也無處不見。

在「彼南」沿海一帶，隱藏著許多「秘密」份子，這些秘密份子不一定是「第五縱隊」，他們完全是為了「良知」幹這種事。有少數來不及逃生的英國軍士，就靠了這些秘密份子供給住宿，供給飲食，在悠長的三年八個月中瞞過了日本人耳目，而終於得救。萬一給日本人或其爪牙查出秘密，那麼他們和那些英國軍士的命運，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另外還有一部份從事危險工作的人員，他們大約可以稱得起是名副其實的地下工作者。當一九四二年初皇軍剛剛佔領彼南，強迫各民族領袖發動市民慶祝遊行，大旗鑼鼓，流氓乞丐，相映成趣；想不到遊行到牛車水時，竟給不明來歷的份子投擲一枚手榴彈，當場炸死了好幾個人。皇軍大肆咆哮，全區戒嚴，挨戶搜查，可是像海底撈月，那兒去找兇手？——然而，這也加深了皇軍對彼南市民的仇視。他的報復，就是彼南史上那有名的「四月大肅清」。

此後有一段長時期，地下工作者表面上好像沉靜了點。這是否由於我們的消息欠靈通，抑皇軍反間諜政策成功？總之，在一九四三年一年中，竟得不到地下工作者的一鱗半爪。據一般人猜度，地下工作者的停止活動大概和皇軍的嚴刑峻法有關。他們自身倒不怕犧牲，但皇軍實行連坐法，一地方出事，那地方的人民就要大遭其殃。為了使一般善良的百姓避免不必要的犧牲起見，地下工作者轉移了工作陣線，也是極可能的事。

一九四四年杪，盟軍「空中堡壘」⁸大炸彼南，地下工作者又突呈活躍。他們

指示空中堡壘轟炸日本的軍火庫、船塢、工廠，收效極宏。當時有很多人奇怪為什麼空中堡壘會事先調查得那麼清楚？因為即使是彼南的市民，也不知道日本的軍火庫究竟藏在什麼地方。當時曾有一粒炸彈落到百大年路，彼南市民事後才知道那條路裡原來貯藏著大量軍火。

話又得說回來，在三年八個月淪陷期內，地下工作者的犧牲想來也是相當大的。他們雖然抱著打倒「法西斯」的無畏精神，不計個人榮辱，可是日本人利用爪牙走狗，仍有若干人難逃他們的魔掌，日本人對付地下工作者手段之殘忍與暴虐，也真是「筆難盡述」；但他們的犧牲，至低限度，說明了彼南人士除醉生夢死外，仍有許多具有正義感的勇士；他們替「彼南」爭回了不少光榮，也加速了英國人重回馬來亞的時間表。

好笑的是竟有一批自命為「地下工作者」的英雄英雄們，在光復後竟大言不慚地向人們宣布他(她)們在日治時期也是做地下工作，而且居然舉出種種證據。一位「小姐」替東洋主子檢舉了許多無辜同胞，竟聲稱她是一百巴仙的地下工作者。一位「女士」和日本人做了一兩年的露水夫妻，而亦振振有辭地說她暗中幫了盟軍不少的忙。這筆爛污賬如果細算起來，大概也只有「上帝」知道了。

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畢竟貨真價實，不必替他們做廣告的。可惜他們當初或許太癡直點了，以為打倒日本法西斯後，真能夠「天下太平」了；若聽到現在日本的秉國者，正在發出「日本將成為東南亞兵工廠」的怪論，不知又將作何感想？

[*編者註]：當時美國空軍最大型的轟炸機，就是「B29 空中堡壘」。

叩地獄之門

要知道日本武士道精華的所在，最好是跑到「彼南」監獄去觀光一下；這裡

面集合了自「神武天皇」登位以後蝦夷子孫的全部精心佳構，兩千年來「東洋」思想的大成；其尤甚者，則是它不僅匯合了日本「本土文化」的精華，更加上「威廉第一」式的軍國民精神，於是而發揮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最大妙用。

這個東洋矮子的恐怖機構，原是舊政權時代的產物。凡從市區沿柑仔園大路到亞依淡的人，一定會在四坎店附近欣賞到一座巍峨建築物，它的四週圍以高牆，高牆上滿插碎玻璃；圍牆外算是「自由」的天地，圍牆內卻變成「地獄」的世界。區區一道圍牆，把人類的生存權利劃了個皂白分明。舊政權消滅後，東洋矮子初來，也懂得裝腔作勢，下令釋放所有罪犯，一方面表示他的仁慈，一方面不妨當作是一種對舊政權的示威。可惜這種「仁慈」為時不久，就全部變了質。

控制這個機構的是日本憲兵部，從一九四二年四月初直到皇軍滾蛋止，監獄裡經常裝滿了各式各樣的「囚犯」，華人是最大主顧，印度人馬來人雖有，充其量不過做陪客罷了。讀者如問這許多罪犯到底犯了什麼罪，那麼只有三個字答案，就是「莫須有」。東洋矮子標榜「擊滅米英」，自然凡「米英」同路人，一概當作仇敵；但它的真正眼中釘，也包括俄記「赤佬」。只要是「赤佬」，不管那一國籍，不問老人小孩，一犯到它手裡，斷無逃生希望。然而奇蹟也常常會發生，在三年八個月中日本的「蓋世太保」雖抓了不下數萬人，真正有資格當得起「赤佬」的，卻一個也撈不到。倒是一大群和和善善的老百姓，常被莫名其妙地送進監獄去。

監獄裡面究竟是些什麼情形呢？鑒於東洋矮子的恐怖作風，要想被送進去的囚犯得到良好待遇，當然絕無此理。根據一位身歷其境者的報告，他在監獄裡面整整住了三個月，這三個月的生活，可拿「污穢、黑暗、饑餓、酷刑、疫癘」及「死亡的威脅」十五個字概括一切。我們想像中地獄裡的各種待遇，在這「大東亞共榮圈」「招待所」裡都可以享受到。所以，倘使我們勉強要一件一件記述下來，倒反而變成畫蛇添足了。

只有一件事覺得很特別。那些「蓋世太保」審判「囚犯」，其一問一答有時候頗使人發噱。下列一段，可見一斑：（所有問答俱由台灣人擔任翻譯。）

問：你是不是赤佬？

答：我不是赤佬。

問：那麼你到底是什麼？

答：我是安份守己的良民。

問：混帳，你是安份守己的良民，怎麼會抓進來？

答：這是冤枉的；我不曾犯罪。

問：放屁！我們大日本皇軍會亂抓人嗎？我們抓進來的都是壞人、赤佬、搗蛋份子！

答：我是冤枉的，……

往往問到這裡不須再問下去，「蓋世太保」手一揮，跟著是一陣鞭笞、灌水、炮烙等；吃得消的在半死不活中被拖出去，吃不消的登時了賬。聽說有一位足球健將在鞭子上身時用手架了一架，矮子馬上大發雷霆，一頓棍棒，當場打死，連屍首也不知去向。

照東洋矮子的邏輯，不管你為什麼原因，只要一抓進來，你就註定是「罪犯」，而罪名也十九是「赤佬」。「赤佬」在當時幾乎同「蓋世太保」一樣令人不寒而慄。許多人寧願接受鞭笞、灌水、炮烙等酷刑，而不肯輕易承認「赤佬」之名，就因為一經承認，便等於宣判了死刑；反之，你不承認是赤佬，而又能捱得過幾頓毒打的話，還有釋放之望。其中又有幸與不幸；幸運的經過數月拘禁，被釋放出來了，雖然大病一場，終還保得了殘生——他們自然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次生命史上的創痕——不幸的縱然逃過了酷刑，而獄中疫癘叢生，不久也與「死亡」結緣。他們雖多活幾天，精神上與肉體上的痛苦卻不易忍受。

那些灌水、炮烙的「共榮圈」產物，在彼南固然已經嚇破了市民的膽，但要仔細研究起來，並無奇怪之處。何以故？東洋矮子的武士道精神，原本寄託在這些嚴刑峻法裡面。可是講到受刑者的痛苦，一頓灌水炮烙與一頓拳打腳踢之間，程度差不了多少。試以東方式的刑罰與古羅馬的作風比較一下，則大可以證明身為萬物之靈者的用心，中外相似。既然如此，我們對於日本人的「文化」產物，又何必去故意挖苦呢！

倒是在那沙丁魚式的牢屋裡，每天拉屎吃飯，實在受不了；一桶滿是糞渣的水，便是解渴的無上妙品。久之獄中疫癘盛行，囚犯個個犯了腹瀉病，因此而死去的，比受酷刑而致死者還要多。就是活著的人，在深更半夜聽聽外面蓋世太保審判囚犯那種可怕的声音，也夠他們受困了。這種精神上的虐待，是無法補救的。

這時候倘忽然讓他們重見天日，再呼吸到一點自由的空氣，我想他們當真要覺得「富貴榮華，於我如浮雲」了。

當獄中犯人病死的太多，而外面犯人又不斷的送進去時，蓋世太保也竟會大發慈悲，將一部份扣留已久不死不活的囚犯釋放出來，這種釋放有時不過零星小數，有時卻有一大批；揣度日本人的意思，無非想叫這些不死不活的人到外面來宣傳一下，讓人人驚心怵目於地獄中的恐怖生活，試問還有誰敢去做「赤佬」哇？

至於受酷刑致死的同胞，屍骨何在，迄今還是一個謎。十年後的今天，在亞依淡和升旗山交界處已經造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路人偶一注目，不難想像到這塊紀念碑的一磚一瓦，都是由無數死難同胞的鮮血造成的。然而除了憑弔之外，昔年地獄裡種種日本人的罪惡，也曾在人們腦海裡重新浮現過嗎？

寂寞的城市

「彼南」渡過了緊張的兩年，到第三年，人們開始發出苦悶的呼聲：「彼南太寂寞了！」

這個時候，每一條街上，商店半開半隱，櫃上夥計神懶氣散，不是打瞌睡，便是光著兩個眼珠子在發愣。顧客稀少，偶有一兩個上門，目的也不專在做生意。玻璃櫥裡，平時琳琅滿目，而今幾乎空空如也，名為商店，其實在擺烏龍。照這樣子，不是乾脆關門大吉嗎？而事實上，關門是不准許的；老闆有數，如果換了三年前，或三年後，那麼開店做生意，唯恐沒有主顧，現在大家做的都是後門生意，當真有顧客上門，零星小買賣，根本不在他們眼裡。有貨物，轉一轉手，賺頭也不小，不比零售更好？所以儘管門可羅雀，儘管老早收市，他們還是照樣有錢賺的，不僅有錢賺，而且發大財。東洋鈔票雖不值錢，老闆們卻用麻袋一袋一袋小心裝起來，大約是等待「善價而沽」吧？聰明的人乘機買房產，購田地，不管契約有沒有效力，眼前落了個便宜再說。「彼南紅人」們在此時期，都著實撈

了不少。因為有地位，有權勢，雖然在日本人跟前打恭作揖，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但只要有錢撈，有什麼相干呢？

另外有一種人，大概以女人居多，也在進行著一種幕後交易。她們上門到會，三言兩語，便可做成了一筆數目可觀的交易。這些女人神通廣大，商店裡看不見的東西，一託她們，總有辦法覓得到。譬如你要買一支手搯花白蘭地，或是一罐三五牌香煙，只要你出得起價錢，她們一定會替你雙手奉上門來。什麼 Tootle 牌的布，Max-Factor 的化妝品，瑞士出產的手錶，英國製的自來水筆，以及金鋼鑽、金飾品，都成為她們交易的對象。大概金飾品的交易是最多的，許多窮人家生活艱難，不得不把家裡一些僅有的金器推銷出去；照當時的市價，一兩黃金可以換到一包半白米。窮人家把金器售出去了，換了白米進來，真可以說明老百姓「貴五穀，而賤金玉」的悲哀心理。

食用品中，則首推白糖；物以稀為貴，這些白色亮晶晶的小東西，和平時期並不值錢，英國人未撤退前，一斤白糖才值幾分錢，一包也不過五六塊錢，但隨著東洋矮子的統治，這些不值錢的小東西平步青雲，做起天之驕子了。日本佔領初期，白糖黑市已經要每斤七八毛，到第三年，一漲漲了一百倍。連糖精也要值五六千一罐。為什麼白糖這樣值錢呢？因為除了家用外，咖啡店每月銷量大得驚人。咖啡烏每杯雖漲到三塊錢，喝咖啡的人仍多。有的咖啡店白糖不夠用，就攙用糖精，於是糖精也跟著起價。至於這些白糖究竟從何而來，據內幕中人說，大都是由日本人偷運出來賣給商人的。不要以為日本人都是扳起臉孔的兇神，講到貪污，他們的本領也著實不差。那些和日本人有上一手的市民，多多少少總弄到點好處。因此「彼南」雖鬧了三年多糖荒，咖啡店卻照樣開著，咖啡老闆的入息，也並不比前遜色。

交通方面，街道上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破洞，交通問題嚴重得無以復加。日本人統制了全部汽車，除了幾輛半生不死的電車外，民間只好以腳車三輪車代步，像現在到處橫行的市虎，在那時候是絕對夢想不到的。日本人重視「汽油」勝過戰士的「鮮血」，汽油統制之嚴更甚於米糖。此時只苦了住在郊外的居民，上落實在不易。以前每天川流不息的巴士車，現在減到只有一兩班，而且行期也沒有一定。你想搭車子必須一清早到車站去登記，然後跑到附近咖啡店呆等，有時從

早上等到下半年，吃飯拉屎都將在咖啡店方便。那些所謂巴士車者，車身老舊是不用說，四個輪胎，補了又補，也難為了我們的技師，到走投無路時，索性在輪胎裡塞滿了破膠胎，胡亂裝上車身，駛起來雖一顛一蹶，總算能對付過去了。此之謂「廢物利用」。汽油呢？自然沒有，聽說最初用油屎，後來「大日本科學家」發明了一種由「棕油」提煉出來的代用品，東洋矮子大喜欲狂，在報上大登廣告，從此巴士車改用「棕油」了。……就汽車進步的發展史來看，棕油能夠當做汽油用，確是東洋矮子的空前奇蹟。

整個城市就在這種「空前奇蹟」的氣氛中捱過去。大多數人吃不飽，餓不死，病了沒藥醫，個個臉上添了菜色；連極樂寺的烏龜都餓得乾癟了。「娛樂公司」雖夜夜顧客如雲，人們不過藉此刺激刺激。樂觀的還憧憬著遠景，悲觀者哭喪著臉，坦白承認他們是在朝慢性自殺的路上跑……。

「彼南」的夜市，也從市區移到五盞燈一帶。碼頭附近，一到夜裡，不用戒嚴，已變成死市。就是五盞燈，在燈火管制之下，也沒有什麼生氣。祇有一個「共榮圈食物攤」，裡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吃品，賭客賭贏了錢，不免要到這裡來狼吞虎嚥。食物攤鄰近遊藝場，有時從場裡傳來一陣陣鑼鼓聲，偶然替這寂寞的城市刺激了一下。但是子夜過後，遊客散去，食檔收盤，人們滿肚子心事，悵望著一片烏黑的天空，也不期而然會發出疑問：

「什麼時候才天亮呢？」